

基于梵汉对勘的

《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

王继红 著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



中西書局

基于梵汉对勘的

《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

王继红 著

中西書局

清华语言博士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 / 王继红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8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
ISBN 978-7-5475-0672-1
I. ①基… II. ①王… III. ①《阿毗达磨俱舍论》—梵语—语法—研究 IV. ①H7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5638 号

基于梵汉对勘的 《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

王继红 著

责任编辑 朱彦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3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672-1/H·031

定价 50.00元

总 序

近二十年来，我国博士生培养事业有了很大进展，在各个领域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在语言学领域也是这样。这些新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大多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是我国语言学事业继往开来的生力军。博士论文和出站报告是他们刻苦攻读、悉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些优秀的博士论文达到了学术前沿的水平，体现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成就。面对这些学术新人和学术新成果，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

众所周知，一门学问要能生根，要能茁壮地成长发展，必须不断挖掘和发现新的材料，必须不断进行理论更新，必须不断涌现大批新的研究人员。语言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相对年轻的学科。中国是拥有语言富矿的国家，汉语历史悠久，语言多种多样；有优良的语言研究传统，新的语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在由于国力日益强盛，更引发各国青年人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我国语言学科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只要我们两岸三地语言学同仁合力研究，让我国语言学科走到世界学术的尖端，这是可望也可及的目标。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并为了使得这些学术新成果更快地

和读者见面，为了帮助这些新人更迅速地成长，以便为语言学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创办了这个《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现在计划每年出版一辑，每辑选收1—5种两岸三地语言学博士的优秀论文、出站报告和其他著作。我们希望《丛书》能聚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人将来能带领中国的语言学迈着稳健的步伐前进。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创办以来，得到了两岸三地语言学界同仁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担任了顾问和编委，很多博士生踊跃投稿，很多专家不辞辛劳负责审稿。清华大学提供了经费，上海中西书局负责出书。大家的热忱支持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办好《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的决心，我们一定使之成为展示我国语言学新思想、新成果的平台，成为语言学新苗茁壮成长的园地。

希望大家对《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办好！

蒋绍愚

2013年6月

序

几个星期之前，继红来信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她的书稿《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已通过北京《清华大学语言学博士丛书》编委会的匿名评审，将纳入《清华大学语言学博士丛书》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她希望我为此写几个字。这部书稿的基础是继红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是2004年夏通过答辩的，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作为我在北大设立“佛教汉语”研究方向后指导的用梵汉对勘的方法和梵汉对比语料完成的第一篇佛教汉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终于能够正式出版，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因此就“欣然命笔”了。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佛教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中印两大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对于中国文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我认为，现有的评价无论多高都不过分。原因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这种影响的认识仍然是初步的，深入的空间还很大。

佛教及其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建基于佛经翻译。根据历代经录，在从东汉到宋代前后约一千年出头的时间里，以西域佛教僧

侣为主的翻译家及其团队，曾经将由印度语及中亚语写成的佛教典籍译成汉语，多达数千部。虽然有许多已经亡佚，但保留至今的仍有1482部，5702卷，约4500万字之多^①。

对于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而言，这是珍贵无比的语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译佛经语言渐渐成为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虽然最初只是作为口语史的重要语料。到了90年代，“佛教（混合）汉语”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来^②，以汉语历史研究为最终目的、但却相对独立于传统汉语史研究的佛教汉语研究逐渐开展（朱庆之，1990/1992、1997/2000）。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佛教汉语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扩大，方法和视角不断更新，成果如雨后春笋，学术地位基本得到确认。

社会（历史）语言学认为，语言接触是导致语言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同语文之间的翻译是一种非典型的语言接触方式^③。接触语言学将佛教汉语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天地——让我们认识到，对于汉译佛典这样的特殊语料，发现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具体是通过佛经的翻译和译经的流布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应是其研究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这一研究

① 根据吕澂（1981），经藏688部，2790卷；律藏210部，879卷；论藏196部，1394卷；密藏388部，639卷。每卷平均按8000字计。王文颜（1984：113）有一个“历代译经（人数、部数、卷数）表”，从东汉到元（1285年），有名有姓的译者201人，包括存经和佚经（1136部），他们共译出2611部，7853卷，约6282万字。

② 说到佛教汉语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曾经概括为“两个混合”，一是源头语印度语（如梵语）与目的语汉语的混合，一是汉语之书面语与口语的混合。

③ 洪波（2011）说：“语言接触有多种样态，因文化传播而导致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发生接触关系，是其中一种类型，汉语与梵语以及中亚地区的一些古代语言发生接触，就属于这种类型。”（姜南2011，页465）

正是探究汉语在这一时期发展演变原因、构建中古汉语乃至近代汉语历史真实面貌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研究可与国际上对古代以宗教经典翻译为特征的跨语言跨文化交流对目的语的影响，如《圣经》的翻译对各目的语的影响的研究遥相呼应，互为补充。

粗略地说，佛教和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或作用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典语言成分进入译文，二是翻译过程中发生言语创新。由于佛经翻译主要是一种将译者母语译为非母语的翻译，较多的源头语的成分进入目的语是必然的；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译经表达的需要，除了汉语原有的各种表达方式被利用外，译者还创造出大量基于汉语原有表达方式的新表达方式。二者带给汉语的，既有传统上认为必然会有的词汇成分，也有传统上认为较少或不容易有的语法成分。这两类新的语言成分或现象最初都只存在于译经当中，随着经典的流布，其中有一些就会进入普通汉语，形成对汉语发展的真正影响。我们所强调的“佛教汉语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把这些影响找出来，弄清楚其来龙去脉。

就来龙而言，首要的是用译文与平行梵文对比分析的方法，发现译文中直接来自原典的成分；其次，用译文与非佛教文献对比分析的方法，发见译文中那些虽与原典无关却独见或首见的语言现象，看看它们的产生是不是翻译时的创造。

就去脉而言，要看看这些新的语言成分和现象是否仅仅存在于译文中，还是超越了译文，进入了中国人的写作当中。因为如果这些成分和现象仅仅存在于译文中，就不能说它们真正影响了汉语。

以上二者是佛教汉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些新成分和现象对于汉语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梵语为代表的古代佛教印度语与同时期的古代汉语在类型上分属典型粘着语和典型孤立语，类型学上的巨大差异使得汉语在词汇方面受到影响的可能性较大，而语法上的影响则不大可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作为导致影响发生重要条件的佛经翻译，是一种特别的翻译。特别是因为古代佛经翻译的译者主体是外国僧人，为了在汉地传教的需要，这些传教士亲自把用母语写成的佛经翻译成非母语的汉语。由于强烈的宗教意识，又由于对目的语的特点缺乏足够了解，造成大量原典特有、汉语没有的语言成分，既有词汇的，也有语法的，被硬译成汉语——它们是全新的、生硬的、不合汉语习惯的，却有着貌似汉语的外衣，保存在被称为“经”的佛教圣典之中。首先，正是这种硬被穿上的汉语外衣，使得那些汉语原本没有的语言成分获得了最终进入普通汉语的必要条件；其次，这些最初仅见于经典中的非汉语成分，借助佛教的力量，在佛经被广为诵读的过程中，开始了它们在佛教以外的传播。毫无疑问，并非所有这样的成分都能真正从佛教汉语中走进世俗汉语；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传播的确使得前面所说的似乎难以发生的影响成为可能（朱庆之，2012）。

上述看法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不但得自我本人的研究实践，更多来自同行和学生们的研究实践，尤其是后者，而这里不能

不提到继红。

坦白地说，我个人的梵语和印度学知识的确少得可怜。但就这么一点儿，已足以让我真正明白，新一代研究者要想做好佛教汉语的研究，必须具有翻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的能力。从1994年起，我在四川大学招收研究生，尝试引导他们从事佛教汉语的研究。为此，我甚至不自量力地给他们开过基础梵语课。当然，由于自己的梵文能力不够，并不成功。1997年，日本辛岛静志教授发表文章，特别对中国学者研究汉译佛经语言时存在的与“原语”有关的问题提出批评，我本人即在其中。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辛岛教授的具体意见，比如针对我所说的译经中表示完成语法意义的语尾“已”是梵语的过去被动分词所表达的完成义的翻译，辛岛认为这个“已”只是独立式所表达的完成义的翻译（蒋绍愚教授即从其说）。其后的研究证明，这个“已”的来源二者“兼而有之”，我俩均失之片面。但辛岛教授认为中国（大陆）学者普遍不具备梵汉对勘的能力，因此难免出错的意见是对的（后来中国台湾学者万金川教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这更增加了我从梵汉对勘能力的训练入手，培养新一代佛教汉语研究者的紧迫感。同年暑假在京参加第三十届国际汉藏语言会议时，在驻地碰见蒋绍愚教授，得知北大仍在为将我调入北大作最后的努力。第二天我正好陪同参会的徐文堪先生到朗润园看望季羨林教授。季先生听说这一消息后说，佛教汉语的研究还得靠中国学者，需要培养更多新人，而只有北大有这样的综合条件。他希望我到北大后与东语系的老师合作。1998年秋我如愿调到北大，即与1990年在北大南亚所梵文学习班教我

梵语的段晴老师联系，商议共同培养以梵汉对勘语料研究佛教汉语的博士研究生。

从2001年到2008年，在教研室的支持下，我在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课程中开设佛教汉语研究方向，其间共招收到3个学生，2001级的王继红和2004级的邱冰与姜南。2000年底，时任哈尔滨师大中文系系主任的傅道彬教授推荐了他们早两届的本科毕业生王继红。继红从哈师大毕业后在我的母校华中师大李宇明教授门下读现代汉语方向的硕士学位，有较好的现代语言学的训练，也有较好的英文能力。记得录取前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为保险起见，继红在报考北大的同时，还报考了社科院语言所，都获得了录取资格。当然最后是我如愿以偿。继红入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从段晴教授学习梵文。当时段老师正作梵文《俱舍论》的相关研究，就建议继红选择《俱舍论》作梵汉对勘。

2000年夏，我受何莫邪教授的邀请，到奥斯陆大学为他的博士生讲授《祖堂集》，同时参加何教授在挪威高等学术研究院主持的汉语语义大典编辑工作的一些讨论。其时胡敕瑞兄北大博士学业结束后，在何先生处作博士后。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有不少印度学和佛教学的收藏，我一有空就与敕瑞一起蹲图书馆，主要是找寻有汉译的梵文佛典精校本及相关研究。我们每次都会把看到的有用材料借出来，利用晚上或休息的时间到高等研究院去复印。正是在挪威，我第一次见到台湾许洋主先生编著的《新译梵文佛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二)》，作者将梵本逐句逐字地作了解析。许先生的目的在于

帮助讲汉语的佛教学习者通过梵文更准确地理解佛典的原义。但其解析的方法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成为后来我要求学生做的梵汉语言对比分析的最初范本（2006年年末，我到台湾中研院语言研究所交流访问一个月，其间曾与许先生见面）。

我给继红的任务是——研究要“基于梵汉对勘”，建议她以许洋主《金刚经》梵语解析和荻原云来《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梵汉对勘为模本，结合汉语史研究的需要，对《俱舍论》的平行梵本作语言学角度的对比分析，“一个虚字也不放过”，即尽可能找出汉译佛经中所有与原典语言有关的成分。在这当中，特别注意译者是如何将典型粘着语梵语复杂无比的形态变化及其意义翻译成典型分析语汉语的，特别注意源头语中有什么汉语中没有的成分因此而进入了佛教汉语。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为了继红。《俱舍论》是印度佛教重要的理论著作，属于三藏中的论藏。与那些以“如是我闻”开头、向大众传播佛理、内容与语言均通俗易懂的经藏不同，论藏的典籍大都是佛教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具有在内容上高度抽象化，在语言上高度形式化或者逻辑化的特点。这类文献也许不是做佛教汉语研究的理想语料，至少不是起步阶段的佛教汉语研究的理想语料。不过，继红在段老师的帮助下，硬是啃下了其中的第一品共二十八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梵汉语言对比分析的内容框架，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知道，这个螃蟹是极不容易吃的，但继红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这个工作的思路 and 方向是可取的。因此，近十年过去了，基于梵汉

对勘语料的佛教汉语研究也有了新的长足进展，不论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研究有多少不足，都不可否定继红第一次成功尝试的意义和贡献。

继红的书与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相比，不论是内容还是篇幅都有较大的改变，集中反映了这十年来她的不懈努力。作为最初的导师和后来的研究合作者，我不便对书本身进行评价。就上面的话，表示祝贺。

朱庆之

2014年6月于香港

目 录

总序.....	蒋绍愚	1
序.....	朱庆之	1

第一章 《阿毗达磨俱舍论》的语料价值

1.1 《俱舍论》之命名.....	1
1.2 《俱舍论》之内容.....	3
1.3 《俱舍论》之作者.....	6
1.4 《俱舍论》之汉地传译.....	15
1.4.1 《俱舍论》汉译者之一：真谛	16
1.4.2 《俱舍论》汉译者之二：玄奘	21
1.4.3 《俱舍论》汉译本比较	24
1.5 《俱舍论》之研究.....	32
1.6 《俱舍论》的语料价值.....	34

第二章 方法论探讨一：梵汉对勘与佛教汉语语法研究

2.1 佛教汉语与汉语史研究.....	36
2.1.1 佛教汉语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	36
2.1.2 佛教汉语是研究语言接触对汉语史影响的重要语料	38
2.2 梵汉对勘与佛教汉语研究.....	44
2.3 基于梵汉对勘的《俱舍论》语法研究.....	47
2.3.1 以梵汉对勘为立足点	48

2 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

2.3.2 语言类型比较的视野	48
2.3.3 描写真谛、玄奘两种异译本语言“自在的结构”	51

第三章 方法论探讨二：语料库语言学与佛教汉语语法研究

3.1 引言	53
3.2 语料库语言学与佛教汉语研究	55
3.2.1 汉译佛经数量巨大，需要计算机的技术支持	55
3.2.2 梵汉对勘是汉译佛经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	58
3.2.3 概率统计是基于梵汉对勘佛教汉语研究的重要方法	60
3.2.4 梵汉佛典的数码化使佛教汉语研究事半功倍	61
3.3 《俱舍论》梵汉平行双语语料库构成及其语段、句子对齐	63
3.4 《俱舍论》梵汉对勘双语语料库的语段、句子对齐	63
3.5 《俱舍论》梵汉对勘语料标注	66
3.6 小结	69

第四章 梵汉语言对比研究之一：梵语名词变格

4.1 前言	71
4.2 体格	73
4.3 呼格	77
4.4 业格	80
4.5 具格	81
4.6 为格	87
4.7 从格	88
4.8 属格	94
4.9 依格	100
4.10 结语	104

第五章 梵汉语言对比研究之二：梵语动词变位

5.1 引言	106
5.2 时体	107
5.2.1 现在时	108
5.2.2 将来时	110
5.2.3 完成时	112
5.3 语态	116
5.3.1 主动语态、中间语态	117
5.3.2 被动语态	119
5.3.3 致使语态	125
5.4 语气	127
5.4.1 陈述式	128
5.4.2 祈愿式	129
5.5 分词、独立式	133
5.5.1 现在分词	133
5.5.2 将来分词	135
5.5.3 过去分词	136
5.5.4 必要分词	151
5.5.5 独立式	153

第六章 梵汉语言对比研究之三：数范畴与人称范畴

6.1 引言	158
6.2 数范畴之一：双数	160
6.2.1 添加连词	161
6.2.2 并列短语	161
6.2.3 添加数词	162
6.3 数范畴之二：复数	163

4 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

6.3.1 并列短语	163
6.3.2 集合概念名词	163
6.3.3 置前复数标记“诸”、“众”	164
6.3.4 置后复数标记“等”	165
6.3.5 词汇手段	167
6.4 人称范畴	168

第七章 《俱舍论》语法仿译研究

7.1 句末因果关联词语“故”	171
7.1.1 汉译佛经中的句末“故”	171
7.1.2 仿译梵语原典中从格格尾	174
7.1.3 仿译原典中具格格尾	179
7.1.4 仿译原典中不变词 hi	181
7.1.5 仿译原典中名词 artha 或以 artha 结尾的不变状复合词	183
7.2 主动语态标记“能”	187
7.2.1 仿译主动语态语尾	187
7.2.2 仿译具有逻辑主语的被动语态动词	188
7.2.3 仿译主动语态后缀	189
7.3 被动语态标记“所”、“可”	190
7.3.1 仿译被动语态语尾	190
7.3.2 仿译被动分词的被动形态	192
7.4 仿译标记“当”	193
7.4.1 情态助词“当”	193
7.4.2 时间副词“当”	196
7.5 仿译标记“应”	199